经济评论

简 报

2011 年第 3 期

《经济评论》编辑部

2011 年 6 月 5 日

编者按

1. 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中的特征值及其理论蕴涵.....陶为群 陶川
2. 产品创新的最优市场结构是什么.....千慧雄 卜茂亮
3. 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必然加剧工资不平等吗.....许志成 闫佳
4. 信息瀑布与钝化信念.....李建标 巨龙 任广乾
5. 中国利率期限结构中存在宏观经济风险因素吗.....孙皓 石柱鲜
6. 中国利率政策与房地产价格的互动关系研究.....郭娜 翟光宇
7. 银行关系、政治联系与民营企业贷款.....唐建新 卢剑龙 余明桂
8. 地方政府引资竞争、FDI 质量与地区经济增长.....杨晓丽 许垒
9. 工资上涨助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李平 宫旭红 张庆昌
10. 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李卓 李林强
11. 我国创新能力积累的主要途径：R&D，技术引进，还是 FDI.....刘小鲁
12. 是什么导致了“污染天堂”：贸易还是 FDI.....苏棣芳 廖迎 李颖
13. 我国出口汇率传递率行业和国家差异的实证研究.....文争为
14. 中美贸易发展对两国政治关系的影响.....蔡洁 陈军亚
15. 基于公平偏好的实验经济学研究综述.....宋建华
16. 金融开放测度方法与指标体系述评.....贾秋然
17. 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魏福成
18. 解读政治关联的“功”与“过”.....赵峰 马光明

《经济评论》简介

编者按

理论一旦为社会大众所掌握，就能焕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为充分发挥经济学研究在经世致用、咨政育人、服务实践方面的功能，以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影响社会精英、影响社会民众，我们决定向《光明日报》、《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文摘报刊以及网站经济频道等大众传媒，编辑出版《经济评论》简报。

大体而言，经济类文章不外乎三种类型：(1) 运用经济学的前沿理论和方法，以经济学专业方式，写给从事经济学专业研究的同行阅读的文章，目的在于探索和研究社会经济；(2) 运用经济学理论，以非经济学专业方式，写给决策者看的文章，目的在于通过影响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思维而改造社会经济；(3) 运用经济学知识，以非经济学专业方式，写给社会大众阅读的文章，目的在于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社会经济生活。《经济评论》简报就是要把第一类（学术论文）转化、简写为第二、第三类文章。凡在《经济评论》上刊发的论文，均由作者改写成 1000—1500 字的简写稿，以非专业方式表达作者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学术洞察与学术思想。

简报文章以原文为基础而改写，兼顾现实性、学术性和可读性。虽是改写，但我们要求文章自成一体，力求以生动的笔调、浅显的案例娓娓道出作者的学术思想，让非专业读者了解社会经济现象，帮助他们思考经济问题，进而获得思想启迪。因此，简报语言平实生动，说理深入浅出，文章简洁明快，尽量避免专业性很强的理论概念、数理模型及其推演、数据表格、专业注释等。阐述观点、研究结论或提出政策建议时，没有罗列大量数据，但有关键的数据或事实支撑。

学术期刊研究成果的社会化、大众化和通俗化是理论服务实践的一项积极探索。我们相信，经过学界同仁的辛勤耕耘，《经济评论》简报将成为一个雅俗共赏的精神园地：既有学术的严谨性、又有表述的生动性，既有理论的逻辑力量、又有实践的事实力量，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现实的感染力，从而使《经济评论》在注重学术品位、不断提升学术水准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学术成果的社会影响，更广泛地服务社会经济建设、服务社会精英和人民群众。

《经济评论》编辑部

经济理论探索

1. 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中的特征值及其理论蕴涵

陶为群（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陶川（北京大学），《经济评论》2011年第3期

生产资料、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要按比例发展，是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型中的一条重要原理，这一原理可运用特征值方法进行严谨、规范的描述。

在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中，两个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都是不变的，因而在每个部类内部，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新创造价值之间都保持着固定不变关系，因而两个部类之间任一个对应部分之间的比例关系，都足以表现整个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所以可以用某个年份两个部类新创造价值之间的比例关系，与两个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一起，共同完整地反映该年份马克思两部类经济增长模型的结构参数。马克思指出，积累是经济增长之源，包括完成积累的社会总产品实现，必须经过两个部类之间的产品交换，并且在产品交换时生产资料生产部类对消费资料的全部需求，等于消费资料生产部类对生产资料的全部需求。从这一交换等式和下一年每个部类新创造价值与所取某个年份本部类新创造价值、剩余价值积累率以及两个部类结构参数之间的关系，可以建立一个下一年每个部类新创造价值与所取年份两个部类新创造价值之间关系的二阶系数矩阵。这个系数矩阵乘以所取年份两个部类新创造价值向量，形成下一年两个部类新创造价值向量。从经济含义上，这个系数矩阵可以被看作“发展速度”矩阵；这个矩阵的特征值，就是下一年两个部类新创造价值向量相对于所取年份的发展速度。因此，使用求矩阵特征值的方法，求解出这个矩阵具有二重（唯一）特征值，表明两个部类新创造价值具有唯一的相同发展速度。这一特征值，又要求每个部类的积累率分别取一个特定值，此积累率特定值，恰好是两个部类新创造价值的相同增长率与本部类的资本利润率之比，是完全被两个部类的结构参数所决定的。

在每个部类新创造价值以特征值相同发展情形下，下一年份两个部类新创造价值之间的比例关系与所取年份相同不变，因此下一年份两个部类的结构参数也都与所取年份相同不变。所以，下一年份的“发展速度”矩阵及其特征值、每个部类的积累率特定值、全社会积累率也都与所取年份相同不变。这样一来，从下一年份起，两个部类的新创造价值发展速度就相同并且保持不变；每个部类积累率也都取特定值不变。这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增长状态，可以称为两部类经济均衡增长；均衡经济增长率恰好等于不变的全社会储蓄率除以不变的全社会不变资本与新创造价值比率，这与哈罗德-多马模型中有保证的增长率含义相同。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二十一章中的第一例，主要例示了两个部类的总产品和新创造价值都以相同而且固定不变的“常量”速度增长情形，这与用特征值方法描述的情形相同。

认识到用特征值描述的两大部类经济均衡增长具有的多种特殊表现，可作为两部类经济

非均衡增长的对照系。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的特征值的存在性、存在状况,从理论上揭示了存在着一种两大部类经济均衡、稳定增长的状况。反过来看,正因为两大部类经济按照特征值发展具有多种特殊结果,是否同时具备这些结果,可以作为检验两部类经济增长是否均衡的条件。应当认识到,两部类经济按照特征值发展,是一种现实中难以达到的状态。因为关于“发展速度”矩阵特征值的理论分析表明,两部类经济达到均衡增长状态,意味着必然全社会劳动者报酬与新创造价值相同幅度增长,必然全社会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在全部资本当中的比重都保持不变,必然全社会积累率保持不变。而按照马克思基于劳动价值论所阐述的资本的生产、流通、周转过程,这些都是现实中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难以达到的状态。即便是全社会劳动者报酬达到与新创造价值相同幅度增长和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由于要保持全社会积累率固定不变,就必须两个部类的企业所有者将剩余价值用于自身消费的比重保持固定不变。而随着生产规模和剩余价值量的不断扩大,企业所有者有限的自身消费所占剩余价值量的比重必然下降,从而导致全社会消费资料需求的增长慢于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形成消费资料相对过剩,进而导致偏离稳定均衡增长状态的周期性经济波动。于是,特征值本身的存在性、存在状况,反过来说明了经济非均衡增长是常态。因而,对马克思的两大部类经济非均衡增长的研究,更具普遍意义。

2. 产品创新的最优市场结构是什么?

千慧雄 卜茂亮 (南京大学)

《异质性条件下产品创新的最优市场结构研究》,《经济评论》2011年第3期

自熊彼特(Schumpeter)提出垄断更有利于创新的论断之后,关于市场结构与创新关系问题的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纵观近60年来的研究进展,大体有四种观点:第一,认为垄断更有益于创新,以熊彼特为代表;第二,认为竞争更有益于创新,以阿罗(Arrow)为代表;第三,认为中度竞争的市场结构更能促进创新,以曼斯菲尔德(Mansfield)为代表;第四,认为创新与市场结构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近年来,学者们由热衷于寻求两者间确切的关系转向探求特定条件下市场结构与创新的关系,在此背景下劳瑞(Loury)开创的博弈模型逐渐成为这类研究的基础框架。

我们遵循这一思路,从产品差异入手,首次同时兼顾原产品间以及新产品与原产间的不完全替代性,拓展了劳瑞的理论模型。据此,尝试对文献中不同派别的观点在统一的框架下给出一致性的解释。通过模型分析发现:第一,对于那些产品差异度极低、创新产品的利润极高、新产品对原产品替代度极低的产业,垄断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创新,熊彼特的观点与这类产业相符;第二,对于那些产品差异度极高、创新产品的利润极低、新产品对原产品替代度极高的产业,竞争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创新,阿罗的观点符合这种特征的产业;第三,以上两种都属于极端的情形,现实产业的特征基本上处于二者之间,只是有些倾向于竞争强一点的市场结构,有些倾向于竞争弱一点的市场结构,因而总体上市场结构与创新的关系表现为

倒 U 型结构，只是一个拐点更靠近竞争还是更靠近垄断的问题。

因而，从创新的角度看，政府在政策上不能盲目地反对垄断或者竞争，而应根据具体的产业特征而定。为更好地促进产业创新，我们建议政府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对于产品差异程度低的产业，最有利于创新的市场结构是偏向于竞争性的，如果此时的市场竞争不足，就会出现创新动力不足的局面，那么此时的产业政策应是消除行业壁垒，打破可能的垄断，鼓励竞争；如果产品差异度极低，虽然最有利于创新的市场结构是完全竞争，但即使是最优的市场结构，企业此时的创新投入也是极低的，原因在于此时的行业已处在产品生命周期的成熟阶段，全行业使用通用的技术，生产标准化的产品，产业内创新的可能性已经很小，此时若要促进产品创新，只有诉诸于公共的研发机构了。对于产品差异度大的产业，适当的垄断更有利于创新，那么此时的产业政策应是扶植龙头企业，规范产业标准，清理小、乱、差的企业，以避免行业租金的耗散，从而促进创新。第二，企业研发（R&D）的边际生产力不影响市场结构与创新的关系，但 R&D 的边际生产力越低，企业的意愿投资越少，而 R&D 的边际生产力低的创新项目多数是基础性的和根本性的创新项目，这些项目所需的投资大、周期长，而且风险大，所以企业投资动力不足。但这些创新项目往往具有战略意义，这些创新是否能够率先成功的完成决定着一国该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在政策上对于这种创新应给予财政上的支持，可以直接资助行业内的领导企业，或是推动公共研发机构开展此种创新研究。第三，产品创新的收益越高，市场的垄断性越强越有利于创新，如果行业内有太多的企业，实际上会降低单个率先取得创新的可能性，这样也就会降低企业的创新激励，对这种行业应该适当地限制竞争。第四，创新产品对原产品替代程度低的产业，行业垄断性越强越有利于创新，相反替代程度高的行业则需要较高竞争性的市场结构，那么，相关部门可以根据创新产品对原产品的替代性来适时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或鼓励竞争，或扶植龙头企业。

3. 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必然加剧工资不平等吗？

许志成 闫佳（深圳大学），《经济评论》2011 年第 3 期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90 年代末以美国为代表的 OECD 国家普遍经历了教育升水，也就是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工人之间工资差距的持续上升。这引起了劳动经济学的广泛关注。90 年代形成的大量文献得到了一个共识，那就是这一期间的工资不平等的加剧主要是由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导致的。

所谓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就是指在这种技术进步的模式下，劳动力市场会更加依赖技能水平比较高的劳动力。从简单的供给需求分析就自然而然地可以理解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提高会使得他们得到的工资增加，而同时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相应地减少，因而造成工资差距上升。

为什么技术进步可以导致劳动力需求的改变呢？90 年代共识对此的解释主要来自于腐蚀效应（erosion effect）和市场规模效应（market size effect）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所谓腐

蚀效应，就是说随着新技术的诞生和发展，劳动力不得不花时间来学习和适应这种新技术，对于低技能劳动力来说这个适应过程肯定比那些高技能劳动力要困难些，因而他们的有效劳动力就被“腐蚀”掉了。而市场规模效应是指企业为了适应新技术带来的市场变化就倾向于更多地雇佣高技能劳动力进行创新活动。基于这两种效应，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进步会导致劳动力需求结构的变化，进而加剧工资不平等。

尽管 90 年代共识比较成功地解释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90 年代末美国等国家工资不平等的发展趋势，但是这一理论还有不少缺陷。首先，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正是新科技革命的高峰期，美国等国家的工资不平等程度不增反降，这和 90 年代共识的预计截然相反。其次，这套分析更为强调劳动力市场需求方面的变化而忽视了供给方面的变化。事实上，当技术变迁发生时，不仅劳动力的需求会发生改变，供给方面，也就是劳动力对自身的人力资本的投资行为也会相应地发生改变。

我们认为存在可能性使得技术进步即使满足技能偏向型的特征也并不必然导致工资不平等的提高，从而更好地补充劳动经济学这方面的理论以及更好地解释发生在美国等国家的现实。当技术进步发生时，作为一个高技能的劳动力必然能够更好地适应这一过程，从而获得更高的工资，因此低技能劳动力同样有动力投资人力资本以便成为一个高技能的劳动力，这使得高技能劳动力的稀缺程度下降，从而在劳动力的供给方面减轻了工资不平等的程度。

因此，想要实现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环境下工资差距并不上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低技能劳动力是否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学习新技术从而成为高技能劳动力。想象一下，教育效率的提高会使得人们的学习更为有效，从而节约了学习的时间和成本。由于成本的降低，个体在面临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时更倾向于获取更高层次的教育，因此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随之而增加。这时所产生的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抵消了腐蚀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的影响，从而产生减小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力。因此，在技能偏好型技术进步环境下，提高教育效率，使得人们可以更容易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对于控制收入不平等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就我国的现实来说，教育效率难以令人乐观。提高教育效率不仅仅会提高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进而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也同时可以起到缓解收入不平等的作用。

4. 信息瀑布与钝化信念

李建标 巨龙 任广乾（南开大学）

《钝化信念维系的信息瀑布及其应用》，《经济评论》2011 年第 3 期

2008 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危机所到之处恐慌情绪相互传染，导致金融市场接连崩盘，全球经济环境迅速恶化。抛开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根源，就其触发及发展过程而言，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信息瀑布（Information Cascade）行为。信息瀑布作用下通过情绪传染引发的群体一致行为，发展态势迅猛并且对其所依存环境和组织具有颠覆性和毁灭性。信息瀑布行为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网络事件的盛行、人们对流行商品的疯狂追捧、自发的社会动乱

和金融危机等群体一致行为背后的触发及形成机理中，总能找到信息瀑布的踪迹。由于传统经济学对信息瀑布等问题解释无力，人们对此类现象往往束手无策。

“序贯决策中，如最初几个决策者公布的选择结果一致，那么后续决策者就会忽略自己的私人信息，遵循已建立起来的行为模式而模仿前者，信息瀑布行为就触发了。”1992年柏克堪丹尼（Bikhchandani）、赫舒拉发（Hirshleifer）和韦尔奇（Welch）首次提出信息瀑布的概念，并用贝叶斯更新法则作为序贯、不确定性条件下信息到信念的加工规则，以此刻画信息瀑布行为中个体与群体信念。我们将信息瀑布理论进一步提炼，首次提出“钝化信念”的概念。所谓信念的“钝化”是指信息到信念的传递不是实时更新的，信息的变化不一定总引起信念的改变。可以形象地理解为如考试成绩仅用及格与不及格来表示，及格线为60分，那么60分和100分（或任一高于60分的分数）无差异均为及格，59分和0分（或任一低于60分的分数）也无差异，均为不及格。此处的学生考试真实分数（0~100分之间）代表信息，最终的成绩（及格或不及格）代表钝化信念，及格分——60分为参照点。其中，信息瀑布行为的参照点是常数，这是信息瀑布行为区别与其他群体一致行为的重要特征之一。

与信息瀑布非常相近的一个概念是羊群行为，日常生活中羊群行为往往泛指所有从众行为，经济学研究中所指的羊群行为有其严格的行为边界，其依存环境中一般都存在一个显性的信念揭示机制，如股票的价格。信息瀑布行为与羊群行为表现相似、作用机理各异，以股市上的“黑色星期一”为例，股票价格的“跳水”过程是羊群行为；而在股价“跳水”的过程中，投资者之间恐慌情绪的相互传染则是信息瀑布。

信息瀑布理论不仅可以解释群体一致行为的发展特征，还为“过度自信的人赚钱较少”的观点提供新的解释视角。信息瀑布行为在个体层面上是符合贝叶斯理性的，我们通过信息瀑布实验研究发现，信息瀑布触发后，放弃自己的私人信息、遵循信息瀑布行为所获得的收益要高于其他行为，一味坚持自己的私人信息是不理性的，为“股市上过度自信的人赚钱较少”的观点提供了实验证据和新的解释视角。

中国经济研究

5. 中国利率期限结构中存在宏观经济风险因素吗？

孙皓（清华大学）、石柱鲜（吉林大学）

《中国利率期限结构中的宏观经济风险因素分析——基于宏观-金融模型的研究途径》，《经济评论》2011年第3期

利率期限结构中包含与宏观经济有关的经济信息，能够体现市场参与者对未来宏观经济形势的预期，因此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的联系是当前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研究的前沿领域之一。同时，在实践中，利率期限结构实际上已经成为美联储、英格兰银行等机构政策制定的重要参照。

利率期限结构作为利率管理的重要内容在我国货币政策制定中的参考作用也日益加强。一方面，利率期限结构是金融市场状态与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重要表现，参考利率期限结构有助于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利率期限结构中包含的经济信息有助于政策制定部门准确地判断宏观经济的发展趋势，进而合理引导市场参与者的投资行为，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减少宏观经济的波动。另一方面，利率期限结构反应了不同期限利率之间的变动差异，参考利率期限结构有助于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利率期限结构的变动情况不但可以体现出货币政策的紧缩性与扩张性，而且可以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否顺畅，所以参照利率期限结构可以对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进行综合评价与分析，进而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宏观-金融模型为描述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联机制进行了新尝试，已经成为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领域实证研究的有效分析工具。宏观-金融模型是利率期限结构模型与宏观经济模型的联合模型，它既可以看成利率期限结构约束下的宏观经济模型，也可以看成考虑了宏观经济因素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宏观-金融模型的宏观经济模块往往包括总需求、总供给和货币政策方程，金融模块则是以仿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为基础。应用宏观-金融模型可以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方法对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

中国利率期限结构中存在显著的宏观经济风险因素。应用宏观-金融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在考虑时变宏观经济风险价格的条件下，宏观-金融模型得到不同期限利率的拟合值与对应实际值拟合较好，因此我国利率期限结构中存在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宏观经济风险价格。其次，不同期限利率可以明显地分解出预期成分和风险溢价成分。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对不同期限利率的预期成分和风险溢价成分均具有明显影响，进而影响利率期限结构的状态。最后，宏观经济冲击在短期上对利率期限结构的整体水平与坡度均有明显影响，在长期上则仅对整体水平的影响较为明显而对坡度的影响相对较小。

我国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的联合动态变化特征的经验证据，可以为进一步加强

宏观经济风险的有效识别和预警,以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与参照标准。宏观经济通过影响市场参与者对未来利率走势的预期和利率政策调整影响着利率期限结构的变动,利率期限结构的变动过程不仅能够体现出金融市场环境的变化,也是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的“指示器”。因此,应该进一步深入识别利率期限结构的经济信息,充分发挥其在货币政策制定方面的作用。

6. 中国利率政策与房地产价格的互动关系研究

郭娜 翟光宇(南开大学),《经济评论》2011年第3期

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使多数国家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更加关注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的变动。房地产作为具有投资和消费双重属性的特殊资产,其价格变动会通过财富效应、托宾Q效应及资产负债表效应影响居民消费和宏观经济。如何在资产价格/金融稳定与一般价格稳定/经济增长两组目标间进行协调成为各国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面临的最大挑战。

近年来,房地产业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与此同时,商品房价格也在不断攀升,全国平均房地产价格在1988-2008年间上涨了671.58%。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不仅侵蚀了居民在其他领域的消费能力,而且对金融稳定乃至宏观经济运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进而也对我国利率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1990年4月-2010年5月,中央银行曾29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25次调整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在中央银行的利率水平调整中,是否关注了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因素?我国的利率政策如何对房地产价格波动进行反应?反过来,利率水平调整将如何动态影响房地产价格?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执行、房地产市场调控以及维护我国金融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有鉴于此,我们采用SVAR模型以我国1998年第三季度到2009年第二季度为分析区间对我国房地产价格与利率政策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利率政策冲击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是正向的,说明我国利率水平的调整不能对房地产价格形成有效的调节,造成利率政策房地产价格传导渠道的失效。相反,房地产价格冲击对利率政策却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利率水平的反应迅速,反应深度较强;同时结合实际利率的模拟分析可知,我国的利率政策尤其是2000年以后的利率水平制定开始考虑到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影响,并对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应。

为了疏通利率政策房地产价格传导渠道,实现利率政策与房地产价格的良性互动,结合实证得出的主要结论,我们给出三点政策建议:一是利率政策应关注房地产价格的变化,并做出合理适当的反应。我国的房地产价格对于未来通货膨胀率具有一定的预期作用,因此,中央银行可以据此构建出广义通货膨胀指标,并可尝试通过利率政策制定对其进行量化的反应,稳定经济波动,降低金融风险。二是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形成以市场资金供求为基础,以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引导的利率体系。使利率能够真正发挥对于信贷的调节作

用,通过信贷途径和资产组合效应途径对房地产市场产生有效的影响,进而作用于宏观经济产出。三是考虑到居民住房需求的刚性,国家应该大力增加住房有效供给,推动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增加居民的房地产财富,进而通过财富效应及资产负债表效应使利率政策的房地产价格传导渠道得以加强。

7. 银行关系、政治联系与民营企业贷款——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唐建新 卢剑龙 余明桂 (武汉大学),《经济评论》2011年第3期

中国资本市场建立的初衷是解决国有企业的融资问题,并且中国的上市程序属于审批制,证监会总是优先考虑国有企业的上市问题,所以能够通过IPO上市在资本市场募集资金的民营企业非常少。然而,外部融资又是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当通过资本市场募集资金存在困难的情况下,民营企业自然而然的就转向向银行申请贷款。但是,由于规模较小、内部控制不完善、经营风险较高、信息披露不充分,民营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时往往受到信贷歧视和融资约束。为了解决融资约束问题,民营企业会动用企业社会资本,与政府或者银行建立一种非正式的联系。

以往关于企业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联系方面,对银行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我国学者更多地关注政治联系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已有的研究发现,政治联系不仅能作为产权保护的法律替代机制,而且能够为民营企业提供融资便利,同时有助于降低行业壁垒获得政府补助,但是却给社会、政府和民营企业自身带来了负面效应,它扭曲了市场资源配置的功能,扰乱了企业正常的经营秩序,侵害了其他企业的利益,滋长了政府官员的腐败,并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

我们通过比较银行关系和政治联系在民营企业贷款中的作用,来探讨民营企业缓解融资约束、获取外部融资的有效途径。研究表明,银行关系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非正式机制,不仅能够使企业与银行建立直接的联系,缓解融资约束,帮助民营企业获得更多银行贷款;而且能为企业提供更多债务融资方面的专业知识,提高企业融资技能。相对于政治联系,银行关系是一种更为普遍和有效的非正式关系。企业在追求建立非正式联系时,应首先考虑建立直接的银行关系,没有必要盲目、一味地同时追求政治联系和银行关系。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银行关系这种非正式机制不利的一面,在我国银行关系较为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具有银行关系的企业会对我国银行信贷市场的资金分配产生较大影响,并可能对无银行关系企业的信贷资金产生挤出效应,这将不利于社会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我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因此,在鼓励民营企业建立银行关系的同时,政府应当加强对国有银行信贷资金分配的监督和管理。

8. 地方政府引资竞争、FDI 质量与地区经济增长

杨晓丽 许垒 (南开大学)

《中国式分权下地方政府 FDI 税收竞争的策略性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经济评论》2011 年第 3 期

中国式分权的典型特征是在政治集权的制度背景下实施经济分权。经济分权改革将地方财政收入剩余索取权让渡给各级地方政府,为地方政府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了莫大的动力。从乡镇企业发展到国有企业改革再到近些年来各地区轰轰烈烈的招商引资等诸多重大经济事件,地方政府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我国在政治领域长期以来实施自上而下的垂直治理机制,上级政府使用 GDP 作为地方官员绩效的主要考核指标,同时使用相对绩效考核体系以降低衡量误差。在这种政治晋升锦标赛中,各地官员更加关心其在比赛中的相对排位而非绝对绩效,从而有动力实施政治收益为正但经济收益为负的经济行为以获得政治晋升,这加剧甚至恶化了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关系,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其中重要表现是地方政府间的恶性引资竞争。

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外资流入以推动地区GDP增长从而获得政治升迁,我国各地区间展开了多层次、全方位的政策优惠竞争,主要手段包括降低外资企业税率、提高财政补贴、兴建港口桥梁机场、不计成本地降低外资企业工业用地价格、放松环境监管标准等。从税收竞争来看,根据2004年中国经济普查数据,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际税率大致为17.63%,其中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和私营工业企业的实际税率分别为19.51%和19.34%,规模以上港澳台工业企业和其他类型外商投资工业企业的实际税率仅为10.21%和10.54%;从土地价格来看,据报道,苏州土地开发成本为20万元/亩,为了引进外资,将地价压至15万元/亩,苏州昆山工业用地价格从2001年的9.5万元/亩降到2002年的8万元/亩,2003年再度降低为6万元/亩。在恶性引资竞争驱使下,周边的吴江、杭州、宁波地区只好将地价压到5万元/亩的超低水平。寸土寸金的上海也加入了这种土地价格战争,上海郊区的土地价格降为5-6万元/亩;而从环境规制标准来看,各地政府明许或默认的宽松的环境规制标准使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在我国屡屡违例,2007年,中国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公布了一份近年来的环境违规企业名单,有超过100家跨国公司榜上有名,其中部分企业还是当地的污染大户,不乏诸如百事、惠而浦、博世等世界五百强企业,也有一些国际知名品牌跨国企业,如日清、花王、嘉仁伯等。多数上榜外资企业来自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这些企业在母国具有良好的环保口碑,甚至某家日本公司在本土的8家公司中有7家实现污染零排放,但在中国却连基本的排放标准都没有达到。

引资优惠条件下,在华投资的外资企业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即使没有制度优惠仍会选择在华投资的“主动投资型”外资企业;一类是以利用国内制度优惠为主要目的“制度拉入型”外资企业。对前者而言,虽然引资优惠并不能改变其选址决策,但可能影响其在国内的经济行为,如利润空间的人为拉大将加剧其对国内企业的挤出效应、降低其引入先进技术的动力等;而后者则直接降低了国内FDI质量,国内大量存在的劳动密集性外资企业以及“三来一补”型低技术含量的外资企业均属此列,这类外资企业在国内没有核心技术,没有研发机构,

也没有决策机构,与正常企业相比更像是在中国设立的一个“加工点”,它们对国家政策制度异常敏感,一旦有风吹草动,就会“一夜蒸发”。2008年1月,两税并轨后,103家韩资企业“半夜逃离”山东,虽然不能说完全因为税率提高,但不能否认,选择在两税并轨实施后立即撤资,税率提高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从上述分析看来,制度优惠可以提高国内FDI数量,甚至短期内也可以推动GDP增长、促进就业,但这将以国内资源配置的巨大扭曲为代价,因此很难想象此类FDI能够推动国内长期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

总之,一般说来作为“资本、专利和相关技术的结合体”的FDI流入在为地区经济直接注入资本的同时,还可以产生多方面的溢出效应,但除FDI数量外,FDI质量也是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不同投资目的、不同技术含量、不同来源国的1美元FDI将对国内经济产生迥然不同的经济影响。经济和政治双重激励下,国内各地区“重量不重质”地依赖制度优惠提高FDI流入,将扭曲跨国公司的选址决策和经济行为,优惠竞争越激烈,这种扭曲将越严重,长期看来不利于FDI在我国经济增长效应的发挥。

9. 工资上涨助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李平 宫旭红(山东理工大学)、张庆昌(南开大学),《经济评论》2011年第3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优势,迅速成为世界加工制造业基地。然而近年来,用工荒、劳动力市场摩擦及工资上涨等问题频繁出现,在此背景下各省纷纷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以应对用工荒对当地经济的冲击,2010年全国30个省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月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长幅度为22.8%,仅2011年一季度就有13个省市再次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据统计局统计数据可得,1999年以来中国名义工资年均增长率高达14.71%,实际工资达12.97%。工资的大幅上涨表明中国以往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转变增长方式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必然选择。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指出,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因此充分发挥技术及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和关键,而中国以往的低工资发展模式是阻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因素。在低工资模式下,企业凭借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依然能够获取利润及生存空间,其进行技术投入及人力资本投入的动力不足。

工资上涨迫使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加大技术及人力资本投入来减少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冲击,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重要契机。工资上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机理可以概括为:技术进步引致效应及人力资本投入引致效应。就技术进步引致效应而言,静态意义上,工资上涨通过改变要素最优边际技术替代率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动态意义上,工资上涨引致有偏的技术进步;此外,工资上涨的“创造性破坏”效应能够促进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的发挥。就人力资本投入引致效应而言,作为生产成本,工资上涨迫使企业加大职工培训来提高职工的技能水平;作为收入的主要部分,工资上涨会促使工人增加对自身及下代的教育投入。运

用中国1992-200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工资上涨在助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其中工资上涨通过技术进步引致效应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但通过人力资本引致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就不同地区的回归结果显示,工资上涨在劳动力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助推作用显著高于其他地区。

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也表明,工资上涨是一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转折点,因此中国应积极抓住这一机遇,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动力。长期以来我国工资水平存在扭曲,劳动力价格偏低导致市场价格机制难以发挥作用,因此中国应积极通过工资集体协商、完善最低工资标准及强化工资增长指导线等一系列措施,建立健全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适时提高工人工资水平。此外,加大技术创新及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在制定各项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政策的同时,加快对外部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再吸收;同时多层次地发展教育和职业培训,加大对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引进,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人力资本支持。

10. 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的研究

李卓 李林强 (武汉大学)

《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的重新考察》,《经济评论》2011年第3期

石油是现代工业的血液、当今世界最主要的能源之一,对国民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中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经济对外开放程度日益提高,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度亦快速上升,石油价格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也逐渐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研究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可以为政策当局制定适时、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在国际原油价格影响中国宏观经济的机制中,价格预期发挥着重要作用,这表现在国际原油价格通过影响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进而影响我国宏观经济,采购经理人指数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制定具有先导作用,其转折点往往领先于国内生产总值4~6个月,是被广泛使用的经济领先指标。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的作用机制表现为:PMI会快速对国际原油价格冲击做出反应;作为领先指标的PMI在4~6个月后将国际原油价格冲击的影响传导至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变动又会影响我国货币供给,这主要因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保证经济平稳增长,因此国内货币政策会伴随经济趋势发生改变;货币供给变化又会进一步影响我国物价水平。

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是衡量一国物价水平的重要指标,反映出一国政府的货币政策与居民生活成本。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会造成CPI小幅上扬,但这种现象并不明显,这种状况可能主要由下述三种原因造成:首先,我国CPI核算所选定的一篮子物品中很少包含能源消耗较高的产品,因此当能源价格上升时,耗能产品价格的上升并不能在CPI中得到较好体现;

其次,价格不能及时对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做出反应,滞后反应往往随冲击减弱而导致影响效应不明显;最后,我国政策当局对物价水平的调控削弱了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对通货膨胀的传递效应。同时,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并未改变中国经济增长的总体走向,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第一,受我国经济旺盛需求和国家政策(如国家投资力度加强、汽车购置税下调、家电下乡)双重拉动,汽车制造、耐用品生产等行业表现出增长态势,抵消了原油价格上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第二,中国石油行业自身较高的收益以及服务于国家整体利益的海外业务扩展,使得企业在成本上涨时可以自身消化一部分负面影响;第三,国家在成品油价格上的适度控制与调整,弱化了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对我国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第四,适时、合理的宏观调控也是弱化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对我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的重要原因。

价格预期在国际原油价格冲击影响中国宏观经济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应对国际原油价格冲击时要重视预期的作用,而PMI为政策当局制定适时、合理的货币、财政政策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经济指标。可见,重视PMI的预期作用,可以为政府应对外部冲击,维持经济平稳增长提供政策支持。

11.我国创新能力积累的主要途径: R&D, 技术引进, 还是FDI?

刘小鲁(中国人民大学),《经济评论》2011年第3期

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与内生增长理论中,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最根本动力均可以归结为技术进步。对于技术后发国家而言,实现技术进步的方式除了直接的R&D与技术创新外,还可以表现为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与模仿,以及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所产生的技术外溢。

自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以来,技术进步的路径选择就成为我国各行业不断摸索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尽管我国很早就确定了自主研发为主、技术引进为辅的对外经济交流方针,但限于薄弱的技术研发基础,技术引进与模仿成为我国企业技术进步中的重要(甚至是主要)组成部分,其中的一种重要的技术引进形式被称为“市场换技术”,即通过允许外商合资设厂来换取对方无偿提供的技术以及研发和管理方面的外溢效应。其他类型的技术进步路线则可以简单地概括为购买国外先进设备和专利以及对外国产品与专利的简单模仿。这种技术引进的技术进步路径得到了我国许多学者的支持。一些学者认为技术引进及其所造成的外溢效应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缩短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另一些学者使用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面板数据和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也表明引进国外技术以及FDI对生产率和地区经济增长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然而,我国许多行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实践结果也表明“市场换技术”正在演变成外资收购与兼并基础之上的外商独资化。实际上,历经20多年的“市场换技术”,目前我国100%的光纤制造装备,80%以上的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和石油化工装备,70%的轿车制造、数控机床、纺织机械设备都被进口产品所占领。基于此类现象,有学者认为,技术进步有路径依赖效应,如不能在引进技术的同时提高创新能力,则技术进步路径将被固化在技术引进上,因

此国内的企业要想实现技术赶超，必须选择自主研发。

因此，无论在现实中还是理论上，人们对于技术引进是否可以作为后发国家技术进步的主要手段尚存疑虑，而其中的主要问题在于，单纯的技术引进是否能够在实现技术进步的同时提高创新能力。为回答这一问题，笔者采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和比较了自主研发、引进国外技术、购买国内技术以及FDI技术外溢在促进我国创新能力积累方面的作用，并讨论了所有制结构和地区差异对这四种因素在创新能力积累过程中作用效果的影响。从基本的分析结果来看，除购买国内技术外，R&D、引进国外技术和FDI对我国创新能力的积累均有显著正效应，且R&D是推动我国创新能力积累的最主要因素。这一结论意味着尽管我国研发基础较为薄弱，但R&D的主导地位仍是值得肯定的。

在所有制结构和地区差异上，我国各项技术进步活动对自主创新能力的影 响也存在较大差异。从所有制结构来看，国有经济比重对R&D过程中创新能力的积累起负面影响，对技术引进和FDI外溢效应中创新能力的积累则具有正效应。这不仅意味着非国有经济更善于在自主研发中积累创新能力，而且还表明，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以及非国有经济比重的逐渐上升，R&D在增进我国企业创新能力中的作用还将逐步增强。对我国创新能力积累的地区差异分析则表明，就东部地区而言，引进国外技术和FDI对创新能力的积累均没有显著效应，只有R&D对创新能力积累有显著的正效应；在中部地区，创新能力积累则主要受R&D和引进国外技术的正面影响，FDI对创新能力积累没有显著影响；在西部地区，引进国外技术和FDI对创新能力积累有显著正效应，而R&D对创新能力积累没有影响。这表明，在现阶段，应当激励中东部地区通过自主研发实现技术进步，提升创新能力。在西部，则应当立足于技术引进和FDI外溢效应向创新能力转化的正面效应，在逐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 基础上实现技术升级和向自主创新型技术进步模式的转变。

12.是什么导致了“污染天堂”:贸易还是FDI? ——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苏桔芳 李颖 (华侨大学)、廖迎 (江西教育学院), 《经济评论》2011年第3期

“污染天堂”假说指出，发达国家一般具有较高的环境意识，在贸易和投资方面的环境规制和排污费征收标准要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这无疑会推动发达国家污染产业生产成本的上升。于是，与环境规制较为严厉国家的竞争者比较而言，环境标准较低国家的厂商将获得明显的成本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的污染产业自然就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其结果是发展中国家变成了发达国家的“污染天堂”。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中国在以出口驱动为导向以及大力引进外资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突出。对此我们不禁提出：是不是中国较低的环境规制标准吸引了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FDI）进入中国？对外贸易与环境污染快速恶化有什么可能的关联？我们使用1999-2008年中国30个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应用新近发展的面板向量自回归

模型 (PVAR), 研究FDI、对外贸易和环境规制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 “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基本成立, 从各个检验结果来看, FDI与环境规制的相互作用并不显著, 而对外贸易与环境规制的关系显著, 可以说, 导致我国环境压力增大的最主要因素, 并非是外商直接投资, 而是自由贸易。进一步分析还发现, 环境规制与对外贸易存在非对称的互动关系: 环境规制对对外贸易存在显著负面影响, 证实了“污染天堂”效应的存在; 但反过来, 对外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环境治理努力的增强。最后选择多种环境规制指标和划分东、中、西部子样本进行稳健性分析, 证实了结论的可靠性, 并且发现中、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对环境规制的正面影响显著, 而环境规制对对外贸易的影响程度, 中部要大于东、西部地区。

上述结论有力地支持了“西方污染中国”的命题。因此对中国而言, 我们建议应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坚持对西方消费模式的批判, 在国际舞台上对力争转变西方“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发展模式问题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 在日益严峻的全球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 应将讨论的焦点从商品生产国转移到商品消费国, 促使西方在承诺减少碳排放、减少污染的责任时, 应做到同期进出口贸易不得变相增加二氧化碳排放和变相增加污染物排放。这不仅仅是符合中国的利益, 同时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13.我国出口汇率传递率行业和国家差异的实证研究

文争为 (重庆大学), 《经济评论》2011年第3期

1993年以来, 中国的国际收支顺差和外汇储备持续高速增长, 而中国政府坚持稳定人民币汇率的政策, 人民币一直承受来自美国的敦促人民币升值以改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压力。人民币升值具有减少中国的贸易顺差的政策效应吗? 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解决人民币升值能使以外币标价的中国出口价格上升多少即人民币汇率对我国出口价格的传递率问题。

一般认为出口国货币贬值具有“奖出限入”和改善出口国贸易收支的效应。由于贬值使出口品的外币价格下降, 引起进口需求增加, 从而有利于扩大出口额, 反之, 由于进口品本币价格变贵, 具有降低该国进口商品进口额的作用。在上述两种作用力的影响下, 出口国的贸易收支得以改善。贸易收支调节的弹性分析理论明确指出, 上述的“奖出限入”效应发生的前提是满足马歇尔-勒纳(Marshall-Lerner)条件和毕肯戴克-罗宾逊-梅茨勒

(Bickerdike-Robinson-Metzler)条件。但是弹性分析法理论上有一个隐含的前提, 即出口国货币贬值时, 以进口国货币标价的进口价格与汇率同比例变动, 而以出口国货币标价的出口价格不随汇率调整。但大量的事实和经验研究表明, 出口价格是随汇率变动而调整的。出口汇率传递意味着, 即使是满足上述两条件, 贸易价格只是随汇率变动部分调整, 或者说“奖出限入”效应被打折了。这一现象意味着汇率政策的国际收支调节效果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比如, 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 日元对美元持续大幅升值并未导致美国对日本贸易的国际收支改善。再比如, 2002年2月-2008年7月, 美元贬值了35%, 但美国的消费品进口价格指数仅上升了6%。

笔者分析了2005年6月-2008年12月,中国与包括美国、日本、韩国、德国、英国、新加坡、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马来西亚在内的10个主要贸易伙伴300多个行业的出口价格数据和双边汇率变动数据,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出口价格的影响程度,重点讨论了不同行业和对不同贸易伙伴出口的出口汇率传递率的差异。研究发现:第一,在短期内,300多个行业的平均汇率传递率值为0.96,总体上的汇率传递率系数为0.94。这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变动1%,以外币标价的中国出口价格平均上升0.96%,总体上升0.94%。人民币汇率变动几乎完全体现为以外币标价的进口价格的相应变动。第二,出口汇率传递率的行业差异很大。其中14个行业的汇率出口价格传递率低于0.5,但这14个行业涵盖了食品、化工、纺织、钢铁、机械等行业领域。可见,人民币汇率出口传递率更多地取决于不同行业的具体的市场结构特征。第三,在国别差异方面:首先,中国对10大贸易伙伴出口的汇率传递率整体上是很高的,汇率传递率系数的取值范围是在0.72~1.24之间;其次,对美国出口的汇率传递率为0.72,意味着人民币对美元升值1%,以人民币标价的出口价格将降低0.28%,以美元标价的出口价格上升0.72%,对美国出口的汇率传递率明显低于对其他贸易伙伴出口的汇率传递率。第四,从同一国家的不同行业来看,美国的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较大;从不同国家的同一行业来看针织服装、非针织服装、机械和电气类产品的国家差异较大,尤其是机械和电气类产品的国家差异更为明显。第五,中国在机械和电气行业对美国的出口中存在明显的随人民币升值调低人民币出口价格以稳定市场份额的行为。但对除美国外的其他贸易伙伴却没有这种行为,这一现象与机电行业的产品内分工模式有关。

上述研究的政策含义在于:首先,人民币升值不会使中美贸易收支产生相应的变动或者说试图通过人民币升值来改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政策效应会被减弱大约30%。第二,由于中国与主要的东亚贸易合作伙伴日本、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汇率传递率均接近于完全,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周期会比较同步,存在区域经济合作的宏观基础。最后,由于我国出口商缺乏汇率风险意识和控制汇率风险的金融工具,出口商使用的报价核算方式是以人民币核算成本然后按当时的汇率换算成美元的模式,这一方式可能是导致我国整体汇率出口传递率高的重要原因。

14.中美贸易发展对两国政治关系的影响

蔡洁 陈军亚(华中师范大学),《经济评论》2011年第3期

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弥漫全球,导致各国经济衰退,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为保护本国市场加剧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势头,引发了许多贸易摩擦和纷争,其中中国是最大的受害者。贸易保护政策势必会对中美两国造成经济损失,同时还可能会对两国政治关系造成影响。在和平和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今天,如何营造良好的多边环境成为各国面临的主要问题。考察中美贸易对两国政治关系的效应,可以有效利用经济手段来解决冲突,稳定两国关系,实现经济平稳有效的发展。

中美关系虽然经历了不计其数的摩擦和大小不一的波动,但双方总能够在发现共同利益中化解矛盾、求同存异,获得两国关系发展的新势头。根据哈佛大学政策研究中心开发数据的方法,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上中美大事记中提取事件,整理出1995-2010年4月美国对中国发起的合作与冲突、中国对美国发起的合作与冲突、中美关系状况。可以看出,近年来中国对美国寻求的合作要多于美国对中国寻求的合作。这表明中国重视与美国的和平友好关系,中国的崛起也会以和平方式崛起。中美之间的合作远大于冲突,说明虽然中美之间存在着许多结构性矛盾,但整体发展态势还是利好的。

通过理论模型论证和实证检验中美贸易对两国政治关系的影响可以发现,无论是从中国对美国、美国对中国还是中美总体来看,中美贸易是影响双边政治关系的重要因素,中美贸易与政治关系长期保持平稳的正相关关系,即贸易具有显著的消减冲突、促进合作的效应。虽然中美贸易的不平衡问题会影响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但中美贸易总体来说对两国政治冲突的消减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不过,两国政治合作并不会影响两国贸易的发展,这是不同于以往研究的结果。这说明中美政治关系对贸易的影响并不一定那么强,在诱人的经济利益面前,中美贸易的发展对政治的依附性在下降。可能是因为在美国,贸易活动的行为者更多是公司和个人而非国家,在制定购买决策时,国家较少干涉企业的经营行为,厂商主要只考虑成本和利润。

中美贸易之所以能够超越不平衡问题成为促进双边合作、减少双边冲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贸易能稳定双边关系的发展。在双边政治和安全关系起伏不定的背景下,贸易合作带来的利益能对双边关系起到稳定作用,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在中国力量上升的过程中,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两个要素——经济交往与战略防范,将长期共存并互相博弈,随着美国对华经济依赖的加深,前者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会逐步增大。第二,中美经济利益能超越其他非生死攸关方面的利益冲突。虽然中美在经贸方面存在着不少纷争,但这恰恰说明中美都是经济理性的国家,都将经济利益摆在国家利益的核心地位。这正是经贸关系演绎出的政治内涵,也使得美国抑制“台独”有着强大的内驱力。台湾问题并不是美国生死攸关的核心国家利益,紧密的经贸关系可以缔造一种基于宽容、理解与顾忌基础上更为依赖的政治、外交与安全关系,中美之间这种贸易合作的迅猛发展大大压缩了美国发起冲突的政治冲动。

由此看来,中美经贸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不仅仅限于对经济的影响,还会对两国政治关系的和谐发展产生深远作用。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所说,“经贸关系一直是动荡不定的中美关系稳定的基石”。因此,金融危机下中美应加强经贸合作以稳定双边关系,美国对中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实属不明智之举。当然,只有当中美双方都认为贸易所衍生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是积极的且需要双方共同努力来维持的,贸易才能够成为抑制冲突升级、促进良好政治关系发展的有效动力。

理论前沿动态

15. 基于公平偏好的实验经济学研究综述

宋建华（厦门大学），《经济评论》2011年第3期

传统经济学建立在自利性假设之上，认为参与人仅仅关心自身利益，纵然人们可能表现出有悖于自利性假设的行为，也只是暂时性的偏离。然而，大量实验研究证明，参与人不仅关心自身收益，也关注其他人收益，甚至愿意牺牲一小部分利益帮助友善之人，惩罚不友好之人，表现为具有社会偏好（social preferences）属性。包括公平偏好（fairness preference）、利他主义（altruism）、妒忌（envy）和互惠（reciprocity）等。许多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包括斯密斯（Smith）和萨缪尔森（Samuelson）等都指出人们是具有社会偏好的，且该偏好将对经济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作为社会偏好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平偏好抓住了人类行为的许多特性，对行为人的决策具有重要影响。一般而言，具有公平偏好的参与人喜欢把自身的收益与平均收益进行比较，参与人的效用函数与收益分配的公平程度成正比，收益分配越公平，产生的效用损失就越小。最近 20 多年的实验经济学利用实验数据证明了人类行为决策中公平偏好的存在，这些实验包括礼物互换实验、最后通牒实验和独裁者实验等。实验研究概括如下：人们不仅仅关心自身利益所得，也关注他们互动当中的其他参与人的收益；参与人的公平偏好程度是有所不同的，有些人关注其他参与人的收益较多，有些则较少；公平偏好对人们的行为决策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影响，在许多情况下，如果不考虑公平偏好所产生的影响，将不可能很好地解释观察到的经济现象。

费尔（Fehr）等对传统契约理论研究做出批判：当参与人当中有一部分是公平偏好类型时，理论上而言，适用于全部参与人是自私自利类型的最优契约或许是非常低效的。他们通过实验比较了三个契约的投资效率，得出结论表明：隐性的奖金契约优于显性的激励契约优于信任契约。如果按照传统的自私自利假设，显性的激励契约是最优的，隐性的奖金契约和信任契约的投资效率是一样的，两个契约当中委托人支付最低工资，代理人提供最低努力水平。实验之所以得出不完全程度最高的隐性奖金契约比不完全程度最低的显性激励契约更加有效，原因在于当契约的不完全程度较高时，可以给予双方更大的自由空间进行互惠交易，具有公平偏好的委托人可以通过采用隐性契约的方式有效省去显性契约中的高昂成本。

有关公平偏好的实验经济学研究有效地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视野，揭示了人类行为决策中公平偏好的存在性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弥补了理性理论框架体系的不足。而从目前学术研究状况来看，还有许多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首先，公平偏好虽然是社会偏好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并不意味着其他社会偏好可以忽略，如何在实验研究中综合刻画这些主要的社会偏好以较为准确地反映出现实当中的人类行为决策，还存在着很大的拓展空间；其次，有关公平偏好下的最优契约研究主要体现在不完全程度不同的契约间投资效率的比较上，而最近

20 多年契约理论最重要的发展就是研究产权配置效率的 GHM 理论, 如何在实验当中研究公平偏好属性下的最优产权配置不仅仅具有理论意义, 也对现实当中的产权改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最后, 参与人的公平偏好受不公厌恶系数的影响, 而不公厌恶系数究竟是外生变量还是内生于不公平分配程度的内生变量, 抑或二者兼有之。明白这一问题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目前我国居民对收入分配现状的不满情绪和迫切希望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改革呼声主要是受一些外生变量的影响, 还是由于收入分配不公平自身的原因造成的, 这对我国即将推进的收入分配改革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如何进一步深入探索并加以确证将成为今后重要的研究方向。

16. 金融开放测度方法与指标体系述评

贾秋然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评论》2011 年第 3 期

作为衡量一国金融开放程度的定量化指标, 金融开放度的构建或选取是研究所有金融开放问题的基础性问题。合理、有效的测度指标有助于准确把握一国金融开放的实际情况, 更是后续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基础。然而, 考虑到各国资本管制措施的多样性和时变性、弱化管制效用的管制客体变通性等因素, 长期以来金融开放程度的测量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和难点。

总的来说, 理论界在金融开放测度上有两种思路: 基于名义或法定规则 (de jure) 的测度和基于实际情况 (de facto) 的测度。名义或法定测度通过考察一国约束金融开放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来衡量金融开放的程度, 反映的是当前一国政府对金融开放的意愿和政策性指引。相关研究对名义开放度指标的构建多从资本账户管制程度和市场开放程度这两个角度出发, 通过对各项管制的放松程度予以赋值来衡量。实际测度则是通过考察金融开放过程中参与主体的行为对市场造成的综合影响, 以在某种程度上真实反映金融开放的深度和规模。相关研究多从金融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两个角度展开: 金融开放的深度反映的是一国在金融开放过程中本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活动与世界的一体化程度, 可通过储蓄率与投资率的关联度、国内外利率差异、股市收益率关联度等一些指标进行测量; 金融开放的广度反映的是一国跨境金融交易的总量规模, 可通过各种跨国资本流动的规模与经济总量的占比来加以衡量。

尽管各测度方法都有其独特的适用性和不足之处, 但总体而言, 名义开放度指标和实际开放度指标又有其内在的共同之处, 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由于名义开放度指标衡量的是一国政府颁布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 反映的是政府的主观意愿, 并非市场当下的状态, 而法律法规的实施和市场主体的响应具有一定的时滞性, 因此名义开放度指标实际上是一种事前指标, 具有某种程度的前瞻性。二、名义开放度指标具有内生性质。一方面, 政府可能会根据资本流动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对资本管制做出调整, 而调整的方向又取决于政府的偏好, 如果政府偏好顺周期操作, 即在经济好时放松管制坏时加强, 则开放程度与经济

效益具有正相关性；反之，若偏好逆周期操作则不然。因此，在做跨国实证分析时这种内生性的依照政府偏见的调整可能会使资本管制的经济效益变得模糊不清。另一方面，资本管制可能与影响经济增长、投资和通货膨胀的其他决定因素有关。三、实际开放度指标通过考察利率、股市收益率等金融变量的跨国相关性或者资本跨境流动规模，以此来间接衡量金融开放程度，反映的是经济状况、政府管制与经济个体行为的综合作用结果，具有较好的客观性和实时性。但问题在于，实际开放度指标测量的是市场现象，会受很多潜在因素的影响，且波动性较大，因此会在多大程度上弱化金融开放度的经济意义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因此，将名义开放度指标与实际开放度指标综合运用，互为参照，或者以此为基础构建出更加完备的指标体系，才能在实际研究中得出更加完善的结论。

17. 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

魏福成（武汉大学），《经济评论》2011年第3期

有关发展与增长的研究表明，物资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本的差异，是导致一国经济随时间增长和巨大的跨国人均收入差异的直接原因。然而，为什么有的国家能积累充足的资本和采用先进的技术，从而实现了持续增长，而有的国家则发展缓慢甚至停滞衰退？如何解释巨大的跨国人均收入差异？经济学家们分别从运气（多重均衡）、地理、文化以及制度和政策四个方面进行了考察。这四种因素都能对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影响经济发展。

第一，运气与多重均衡假说认为，人均收入的跨国差异，源于在多重均衡中的不同选择。许多研究认为，现代经济在生产 and 投资方面都存在外部性和互补性，由于预期或信贷市场不完全的程度的不同，可能导致经济行为人之间的协同成功或失败，则多重均衡将会出现。因而，给定各种相同的参数，两个经济体能够展现出完全不同的行为：一个是高的人均产出和持续的增长，另一个是贫穷和停滞。

第二，文化与宗教信仰假说强调的是，不同社会（民族）具有不同的历史经历或宗教信仰，从而具有不同的文化。许多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认为文化是价值观、偏好以及信念的一个关键的决定因素，而后者对经济绩效具有重要作用，所以，文化差异可能会导致经济绩效的差异。

第三，地理因素假说宣称，气候和地理对于人们的工作努力、激励和生产率等有重要影响，因此对收入水平产生了直接影响。相对于前两种假说（运气假说和文化假说），地理因素假说是较为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第四，制度和政策假说认为，制度和政策决定了经济活动的成本与收益的分配，从而决定了经济行为人在劳动供给、资本积累、对技术的采用和创新、对风险的承担，以及提供公共品等方面的行为。持续的经济增长离不开“好的”制度，比如，私有产权保护能够激励各种投资和增加产出的活动，相反，掠夺性制度导致投资不足和低的生产率，从而阻碍经济发展。

然而,在对许多经验特征事实进行考察,或者同时将制度和政策考虑到计量检验模型中时,就能发现,运气(多重均衡)、地理和文化都无法解释人均收入的跨国差异。相反,尽管不存在完全一致的看法,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相信,制度和政策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为根本的因素,因而也是导致巨大的跨国人均收入差异的基本原因。计量检验表明,制度和政策的差异,能解释人均收入跨国差异的大部分。

一些有害的经济制度和政策造成了各种各样的壁垒,使得资源和租金从非精英(工人)转移到精英(掌握政治权力或具有政治影响力的人)手中。这些制度和政策扭曲了经济激励,阻碍了技术引进和创新,也阻碍了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积累,并使市场组织方式处于无效率状态。

然而,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利益集团和政策制定者(政府),为什么不取消无效率的制度和政策,以促进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然后通过税收和再分配手段获得更大的租金?第一种可能的原因是政府缺乏直接和有效的财政工具,以致“政府能力”不足以收取足够的租金和税收,从而导致各种有害的间接分配工具(如进入壁垒等)的使用,以维护精英(具有政治影响力优势的集团)的市场垄断地位以及降低生产要素的价格,提高他们的利润。第二种解释是,尽管取消有害的壁垒和障碍能促进新技术的引入和资本积累,从而提高精英(强势利益集团)掌握政治权力时的租金,但是这些经济变化可能会对它们未来掌权产生不利影响。如果后者的效应足够大,那么精英就会阻碍生产率的提高。第三种可能的原因是,在其他情况不变条件下,经济发展条件的改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或产业升级等)并不一定能给权贵阶层带来更大的预期收益,因而权贵或利益集团仍然会设置有害的制度和政策。比如权贵和利益集团阻碍产业升级的两种可能原因:税收掠夺和中间品价格的操控。一方面,产业升级会降低均衡税率,这有可能降低权贵通过税收获得的收益;另一方面,欠发达国家许多重要的中间品的生产和自然资源都掌握在权贵和利益集团手中,而产业升级有可能降低对这些中间品的需求和价格,导致权贵的利润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权贵阶层就会使用政治权力阻止产业升级。

18. 解读政治关联的“功”与“过”

赵峰 马光明(北京师范大学)

《政治关联研究脉络述评与展望》,《经济评论》2011年第3期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可以称为“关系”,那么企业与政府的联系称为什么呢?我们不妨称之为“政治关联”。具体来说,如果一家企业的总经理、董事长、高管是现任或曾任职于政府、军队,或者是议员或人大代表,那么这家企业就属于政治关联企业。政治关联具有普遍性,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它都很常见。既然政治关联反映的是企业和政府的关系,那么它与腐败贿赂是否有关联?国内外绝大部分学者认为政治关联有别于腐败贿赂,它在法律层面上是完全合法的。

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政治关联究竟为什么产生？巴特斯（Bartels）等学者认为，政治关联产生的动机是由这些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决定的，制度越落后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动机越强。特别是在那些贪污腐败程度较高并且法律制度不完善的国家，政治关联更为盛行。从而，政治关联与法律制度之间实际上隐含着一种相互替代的关系。

既然政治关联如此盛行，那么必然会对建立政治关联的企业有好处，也就是有“功”，那么“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政治关联会对企业价值产生影响，虽然有少数反对的声音，但多数研究认为政治关联能显著提升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价值。其次，政治关联能对企业的财务活动产生积极的影响，例如：在一些法律制度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私营企业融资困难，而建立政治关联之后就可以比较容易获得银行贷款；而且，建立政治关联的企业支付的有效税率也较低，还更容易获得进口许可证和政府合同，在陷入困境时更容易获得政府的优先救助，政治关联企业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概率也较低。

凡事总有两面性，政治关联有“功”，也就会有“过”。虽然政治关联可以给某些企业带来各种好处，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却并非一定是好事。意大利学者钦加诺（Cingano）发现，政治关联给私营企业所带来的好处实际上源自于对公共需求的扭曲。中国学者陈敏菊则指出，企业的政治关联是企业与政府博弈的结果，少数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从中获得了利益，但政治关联给社会、政府、民营企业自身都带来了负面效应，它扭曲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扰乱了企业正常的经营秩序，使那些没有建立政治关联的企业面临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余明桂指出，虽然政治关联能够给处于落后制度约束下的企业带来诸如融资便利、税率优惠等好处，但是这会扭曲整个社会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降低了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

从长远来看，企业政治关联这种现象最终的发展趋势会怎样？实际上，企业政治关联是法律制度不健全的产物，随着法制的逐步完善，政治关联的作用将会逐步降低，它必将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企业应该在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中去竞争和发展，而不应依赖来自于政治关联所带来的好处。为此，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应该健全和完善法律制度和市场体系，限制政府部门随意干预经济的行为，以营造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压缩政治关联的作用空间，这才是推动企业健康发展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所在。

《经济评论》简介

《经济评论》是由教育部主管、武汉大学主办的经济学术期刊，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人。自1980年创刊以来，本刊立足于中国经济实践，瞄准当代世界经济理论前沿，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现代化、本土化和规范化。本刊设有中国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研究、经济理论探索、理论前沿动态、新书评介等栏目，发表经济学领域各类学术规范、方法现代、研究深入且具原创性的学术论文和评论文章。

《经济评论》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CSSCI来源期刊。近年来，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要求和当代经济学新的发展态势，《经济评论》适时调整和更新研究主题，强调现代经济学新的研究方法，大力扶持青年才俊；另一方面，全面落实双向匿名审稿制度，进一步加大了与国际学术刊物规范接轨的力度，不断提升《经济评论》的学术质量和学术品位。

据中国知网统计，本刊的机构用户分布在27个国家和地区，如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个人读者分布在28个国家和地区。每年都有大量论文被《新华文摘》、《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校文科学术文摘》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各种期刊等众多报刊文摘转载和转摘。

根据最新出版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08)，全国经济学理论核心期刊文献计量学评价中，《经济评论》排名第4；根据最新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8)，在全国综合性经济学专业期刊的文献计量学评价中，《经济评论》位居第5。

作者可以进入本刊网站(<http://jer.whu.edu.cn>)网上投稿审稿系统在线投稿。根据相关提示操作，即可完成注册、投稿。完成投稿后，还可以通过“作者中心”在线查询稿件处理状态。本刊不收取版面费、审稿费等任何费用。

主管：教育部

主办：武汉大学

编辑出版：《经济评论》编辑部

简报责任编辑：杨丽艳

联系电话：027-68754563

E-mail: whujer@163.com